

• 科学技术史 •

农耕技术对州县社会的形塑作用

——以明清时期汉中府为例

The Interleaved Changes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stricts in Hanzhong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卜风贤 /BU Fengxian 武文花 /WU Wenhua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119)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摘要: 明清时期, 汉中府的农业开发与政区调整呈现动态互动关系。在人口方面, 经历了明代前中期增长、明末清初锐减、乾嘉时期恢复、道光后递减四个阶段; 农业垦殖则呈现由平原向山地扩展的趋势, 至乾嘉时期达到顶峰, 仅清初出现短暂荒芜。与之相应, 政区建制自明中叶开始频繁调整, 经过多次析分增置, 到乾嘉时期才趋于稳定。研究发现, 人口波动直接推动政区调整, 而移民引入的农业技术革新则是深层动因。通过土地开垦和技术改良, 区域资源得到有效开发, 最终促成清末稳定的县域格局。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揭示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机制, 也为当前秦岭生态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 明清时期 汉中府 农耕技术 政区调整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s in Hanzhong Prefecture exhibited dynamic interactions. Demographically, the region underwent four distinct phases: growth in the early-mid Ming, sharp declin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recovery in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and gradual decrease after the Daoguang reign. Agricultural expansion progressed from plains to mountainous areas, peaking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with only brief abandonment in the early Qing. Correspondingly,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underwent frequent reorganizations from the mid-Ming onward, stabilizing only by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after repeated divisions and addit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directly drove administrative changes, whil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troduced by migrants served as the underlying catalyst. Through land recla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regional resources were effectively utilized, ultimately shaping the stabl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by the late Q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not only elucidat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land relations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fforts in the Qinling reg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nzhong Prefectu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ministrative area

中图分类号: N09; S341.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10.007 CSTR: 32281.14.jdn.2025.10.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灾害治理的知识史研究”(项目编号: 24AZS013)。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10日; 返修日期: 2025年4月6日

作者简介: 卜风贤(1966-)男, 甘肃静宁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与灾害史。Email: bfengxian@snnu.edu.cn

武文花(1989-)女, 山西太原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与灾害史。Email: sxwuwenhua@163.com

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先秦时期已经成为梁州、雍州属地。战国时秦伐楚后，于秦更元十三年（前312年）始置汉中郡，汉中地区政区建置的历史沿革由此开始。在此后两千年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区建置时有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动因莫不与农耕生产的发展相关联。当农耕兴盛发达时，汉中府就会析分出更多的县级政区；当地方经济衰退甚至萎靡不振时，汉中府辖区范围内的州县建置也会停滞不前，甚或出现州县撤并的情况。农业生产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这种关联性特征，是农耕社会时代地方治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农业生产促进了政区建置，政区建置维系了农耕社会。

一、明清时期汉中府的政区调整

明清时期汉中府辖区范围经过一番大的调整变动，直接影响到陕南地区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以至今日考察汉中府的历史变迁时，也需要回顾和审视明清时期的政区沿革和农业开发进程。因此，在历史地理学和农业历史学研究基础上，有必要以汉中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究分析政区变革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因为政区变革而产生的一系列地方社会发展问题。

汉中府位于陕南一隅之地，在陕南地方社会史研究中涉及汉中地区农业开发及相关问题者主要有萧正洪、张晓虹、耿占军、颜玉怀、

樊志民、吴宾等，^{[1]-[5]}且以明清时期为研究时段。在陕西省政区变迁研究中，除却通代疆域政区地理研究专著外，^[6]李大海、胡英泽等也做过汉中府断代专题讨论，^{[7]，[8]}或为专门的政区地理沿革考证，或为政区变动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迄今未见集中考察汉中府农业开发与政区变迁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成果。

汉中府地处秦巴山区西段，境内除了中部的河谷，几乎都是山地。因此，整体地貌单元类型相对单一，自汉代以来千余年间，州县行政建制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但自明代开始，汉中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剧烈演变。经过明清时期数百年的政区调整，至清代道光年间汉中府的行政格局基本形成（表1）。^[6]

由此可见，明清两代汉中地区的行政区划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州县归属关系变动频繁，明代在汉中府之外又设金州、宁羌州、兴安州，辖境多有交错，且兴废不常；二是县级政区不断增多，明代中期以后汉中增设了白河县和紫阳县；清代乾隆后汉中相继增设留坝厅、定远厅、佛坪厅。清道光之后，汉中政区调整完成，再无发生大的变动。现今陕西省汉中市所辖10县，大体上与清道光时期无异。

导致明清汉中地区行政区划剧烈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开发。明代以来随着移民涌入，山地开发不断深入，这是扩充州级政区，增设县级政区的前提条件，宁羌州、兴安州，以及白河县、紫河县、留坝

表1 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政区变化

时间	州县建置情况
洪武五年（1373）	汉中府辖洋县、南郑县、城固县、褒城县、西乡县、凤县、沔县、略阳八县。金州辖平利、石泉、洵阳、汉阴四县。
成化十三年（1477）	金州再增白河县。
成化二十二年（1486）	汉中府新增宁羌州，沔县、略阳县改隶于宁羌州。
正德七年（1512）	金州再增紫阳县。
嘉靖三十八年（1559）	石泉县、汉阴县和沔县改隶于汉中府。
万历十一年（1583）	金州改为兴安州，石泉县和汉阴县又归属于兴安州。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兴安州升为直隶州，不再隶属于汉中府，其下治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
乾隆三十年（1765）	分凤县南、褒城县北新增留坝厅归属于汉中府。
嘉庆七年（1803）	分西乡县南增设定远厅隶属于汉中府。
道光四年（1824）	分洋县北、周至县南增设佛坪厅隶属于汉中府。

厅设置多与此有关。另外,由于聚集的人口源流复杂,容易滋乱生事,如清代“白莲教”起义等,促使当局在军事镇压之外,逐步采取增设行政机构的方式强化地方治理效能。明代石泉和洵阳等县的设置,清代留坝厅、定远厅、佛坪厅的设置均有类似的背景。此外,由于汉中府位于川、陕之间,地处秦岭山地之上,地形复杂而且山林盘踞,故此人口密度小。为便于地方治理,明代朝廷在县以下增设了次县级行政机构。例如,在南郑县的青关设有巡检司。到了嘉庆中期,朝廷还在周至县与洋县交界的袁家庄设立了周洋县垂,以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管理。([9], p.62)此后汉中政区逐渐趋于稳定,从波动到稳定,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汉中人口变化及山地农业开发的趋势。

二、汉中地区的农业技术选择

汉中府因具有独特的地形条件和气候环境,农业开发历史相当悠久,但多局限于盆地,周边山地则很少,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基本特点。明清时期是汉中山地农业开发的重要时期,特别是随着流民垦殖和域外农作物的传入,当地农作物结构和农业种植范围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技术得到创新和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农耕区域的大幅度拓展。

1. 农业开发的历史进程

相对于陕南的其他地区而言,明代汉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相对发达。除了种类繁多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还有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和逐渐发展的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劳动力的增加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的变化则严重影响着当地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元末明初陕南地区经历农民起义以后,本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空旷之状达到空前”。^[10]随着政府在劝课农桑、奖励垦荒等方面的政策施行,汉中的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重屯田以保障战争需求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嘉靖时汉中府“军民户共31977户,口206315”。^[11]人口的增长带

来了劳动力的增加,土地垦殖不断扩大,“总田额为4852顷31亩”,^[11]促进了农业开发。

清代因为地区人口的增长和高产农作物品种的引入等,成为汉中地区农业开发的重要时期。乾嘉时期人口增长,道光年间人口达到高峰,汉中地区山地资源也开垦殆尽,农业进入深度开发期。同治以后由于农民起义等原因造成陕西人口流失,加之汉中山区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经济有所回落。汉中山地农民耕种时“粪土之宜全所不知”,仅“恃土力之厚”,^[9]几经耕种,“山地久耕利薄”,农业收成持续不佳,最终“前由山外迁移而来者,又复转徙而去”。^[12]因此,汉中农业逐渐呈现衰退之象,加之灾荒连年,土地荒芜,随之人口流徙,“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当青黄不接时,民间十室九空”,^[13]流入之民再度迁出,农业生产再次回落。^[14]

2. 农耕技术选择与适应

(1)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汉中地区有汉江和嘉陵江流经,又因盆地地形影响,气候温和湿润,然地形差异较大,导致降水分布不均。不同的地理环境,适宜不同的农业生产活动。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利建设技术不断改善,有效的促进了地区农业开发。也正是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使得汉中地区的水利建设分布很不平衡,汉江谷地水利建设特别发达,而周边的山地区域则很是薄弱。

纵观汉中地区的水利发展史,明代开始,汉中地区就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不仅重新修整旧渠,还开凿新的渠堰。五门堰地处城固县,因使用时间久而问题频出,“明弘治十三年,郝公晟积薪举火醋激石峡,由是下游田五万,不假人工自浇灌”。^[15]嘉靖和万历时期也是兴修水利的关键时期。嘉靖时期金州兴修千工堰,万历年间洋县改木槽为石槽,修灊滨堰、斜堰。水利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水利建设,至明末时,各县几乎都有渠堰的兴建,只有凤县、宁羌州、略阳县没有渠堰开发。明末战乱之后,各县渠堰受损,清初才得以恢复水利。洋县、南郑县、城固县、褒城县、西乡县经过了渠堰的修葺和开发,雍正末年时各项水利建设基本恢复。而

且相较于明代,清代的农田水利得到进一步开发,各县的渠数均有增加,汉中府尤以西乡、褒城为最,其后划分而出的兴安州下辖汉阴、洵阳二县新增最为突出。(表2)

(2) 种植结构的适应调整

汉中府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区域种植结构的复杂,农耕技术的适应性调整进一步促进农业开发。汉中盆地作为主要的农耕区,明代以前基本以稻麦为主,也有种植各种经济作物。通过更加精细的耕作方式和水利建设的兴修,农业生产一片繁荣。

汉中地区山地、河谷、盆地等多种地形并存,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复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使得汉中地区能够种植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主要为稻麦、玉米、马铃薯等。汉江谷地由于良好的水热条件,成为种植水稻的主要区域。汉水流域“畎浍周布,沮洳灌溉,每秋成,多稼如云露积坻”。^[16]其中西乡、褒城、南郑、略阳是主要的水稻种植地区,明末清初,全国各地因为战乱农业生产均受影响,汉中盆地因为相对封闭而影响不大。康熙时期,其农业生产就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水田漠漠,霞租万顷,亩可十种”。^[17]此外,又开垦新地“引山沟水以资灌溉,每处或数十亩十数亩不等”。^[18]因此,清代的水稻生产规模甚大,水稻种植遍布汉中农耕区。麦、豆作为当地传统的旱地作物,清康熙之前,稻麦一年一收,“是以岁止一秋”。^[18]康熙年间,才发展冬水灌溉技术,改为稻麦两熟制,麦豆产量提高将近一倍。到嘉道时期,水热条件好的地方已可以实行稻麦两熟制。稻麦种植主要局限于平原盆地。乾隆年间因移民的迁入陆续引入了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外来作物,则进一步推动了山地的开发,至道光年间“南坝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19]如定远厅“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20]耕作制度的改进和优良品种的引入也导致汉中地区的农作物生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稻麦二熟制度在汉中地区获得推广和施行,提高了复种指数,有助于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而且,根据方志记载整理,汉中地区光水稻就增加了大致20个品种。同时,移民随着种植环境的不同,还不断培育新的品种。

(3) 商品化程度提高

至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桑蚕、烟草、茶叶、棉花等,其背后更反映出深层次商业机理和技术机理,特别是植棉种烟的行为无疑是受国际市场大环境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粮食供给。明代汉中就有种植桑树的历史,而大规模的桑蚕生产于清代才开始。康熙年间,朝廷鼓励桑蚕养殖。洋县两年内种植一万多棵桑树,桑蚕业最为发达,“独洋县最盛而民富”。^[21]这主要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养蚕条件:“山蚕一年两次”,^[21]生产周期短且收益快。即便在山区因霜期早而不适宜秋蚕养殖的情况下,春蚕的放养仍能保证稳定产出。且“拈丝纺线,妇女皆可为之”,^[21]与其他生计相比既便利又经济。桑蚕养殖在洋县、城固县一度有赶超粮食作物的趋势。而后由于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带来的战乱影响,以及江淮桑蚕产业的发展,汉中地区的桑蚕养殖到嘉庆、道光时已逐渐衰落。棉花的种植发展类似于桑蚕养殖,受朝廷鼓励和支持,乾隆以后得以发展,嘉庆中期形成规模,除了汉水谷地,周边山地也有种植。宁陕县“纺棉绩麻,人人能之”。^[22]后光绪年间引入新的棉花品种,加之清后期科技的发展,引入机械生产,棉花生产成为汉中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另外,茶叶在明清时期一直就是汉中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后因清政府茶税过高,“西乡(茶税)二万六百八斤五钱”,^[23]汉中茶叶逐渐衰落,仅存部分小茶园。烟草则于明末清初传入汉中,

表2 明清时期汉中渠堰开发情况

县名	南郑	城固	洋县	西乡	褒城	沔县	金州	石泉	汉阴	平利	洵阳
嘉靖渠数	17	17	16	10	10	10	3	4	2	3	1
雍正渠数	22	22	20	32	23	14	8	4	17	3	22

康熙时初具规模，因经济利益巨大，大量农田改为烟草种植产地，嘉庆已降，“汉川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9]

三、农耕技术对汉中府人口分布的影响作用

明清时期汉中府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区域内农业经济开发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人口数量与农业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人口数量多，劳动力充足，土地开发充分，农业发展迅速，反之农业凋敝。在明朝初期，朝廷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耕作、奖励开垦荒地等。这些举措有效推动了汉中盆地农业生产的快速复苏。清代以后随着流民垦殖和高产农作物品种的引入，汉中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汉中地区政区建制也正与当地人口变化、农业发展和政府决策等多方影响所致，而人口变化则是促成汉中府农区和政区律动最直接的动因。

1. 各地人口增减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灾害、战乱等不可抗因素，以及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汉中府的人口随之发生变化，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呈现出两升两涨的态势（见表3）。^{[11], [19], [24]} 具体来说：

第一个阶段：明初至明末，人口从45650

增至394520，增长幅度有8.6倍之多。明初时期，汉中府所辖地区人口较为稀少。据天顺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府下辖各县的里数如下：南郑县五里，褒城县二里，城固县十里，洋县十里，西乡县五里，凤县六里，沔县二里，略阳县一里，平利县一里，石泉县一里，洵阳县四里，汉阴县二里，金州四里，共五十三里。^[25]按照明制统计，一里一百十户，若每户五人，则大致五万人左右，足见人口数量很少。但至明末时，汉中人口已达394520人，远超之前的数值，这也是明代时汉中地区人口的高峰值。

第二个阶段，顺治至康熙初，由于战乱，人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394520下降至221568，降幅有44%之多，直到康熙末年仍未恢复到明末时期的人口水平。经过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汉中“盖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也”。（[26]，p.14）一时之间，这里人口流失严重，土地荒废。至顺治年间时，“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26]，p.16）

第三个阶段，康熙至道光时期，人口呈现爆发式增至，汉中人口从221568增至1119900，增长了5倍左右，增长幅度和增长梳理均超越了明末。据雍正《陕西通志》记载，雍正十三年陕西实在丁2096964丁。^[27]据薛平拴在《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中推算，顺治年间陕西人口为清代人口的最低谷。^[28]其后，随着政府实施垦

表3 明清时期汉中府县人口变化表

时期	嘉靖二十年	明末清初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五十年	道光三年	光绪二十三年
留坝厅						23626
南郑县	12131	35181	21891	23765	262000	114072
城固县	20515	93577	75367	79541	210500	183673
洋县	30454	107591	77247	81342	239800	119222
褒城县	4638	19800	8174	9462	156900	
沔县	4358	19016	8091	9312	134700	60488
宁羌州	15373	47367	3698	772	46600	55381
略阳县	6335	33649	6002	9237	69400	72354
西乡县	18492	38340	21098	25412		175065
定远厅						87596
佛坪厅						19146
总计	86600	394521	221568	238843	1119900	910623

荒优惠政策和移民安置举措,许多外地流民开始向秦岭东部、商丹盆地以及邻近的低山丘陵区域迁移。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来自江南安庆等地的移民率先迁入商洛地区,随后引发连锁效应,迁入者日渐增多。此后,更有以数百万计的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贫民涌入秦岭地区。清政府为了地区的管理,逐步将兴安州升为兴安府,划分出汉中府,随后又在汉中府中依次增加了留坝、定远、佛坪三厅。

第四个阶段是从道光至光绪年间,汉中地区的人口又有所下降,光绪末年时汉中人口910623,与道光峰值相比,下降了20%左右。从上表可以看出,汉中府除宁羌州和略阳县外,其他各县人口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更有甚者可达50%之多。究其原因,道光年间开始,清政府就开始限制外省流民进入山地进行土地垦殖,大大减少了汉中府的人口增长。另同治元年李永和等农民起义爆发,率军攻入陕南,在洋县建立政权。又太平天国起义军也进入陕南,几经战乱,人口逃亡众多。一时之间,西乡县死亡不下二万余人,^[29]沔县“大兵之后,荆棘遍野,十室九空”。^[30]加之同光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人口数量只减不增。

2. 人口分布与农业技术选择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人口密集地区,农民普遍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这种劳动密集型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而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受劳动力限制,农业生产往往采取较为粗放的经营模式。这种技术分布格局反映了人口密度与农业开发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31]因此,农耕技术与人口分布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农耕区主要分布在汉江谷地的平原地带,而周边的山地之中则分布很少。就农作物类型而言,汉江谷地主要种植水稻、麦豆等粮食作物,还有蚕桑等经济作物,种类繁多,种植结构相对复杂,需要投入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劳动力需求高;而山地区域则种植作物相对单一,玉米、甘薯等作物生长适应力极强,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也相对较少。

明清时期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土地开垦需要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补充,加之外来农作物的传入和赋税制度的变化,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呈现阶段性变化。

元末明初汉中经战乱和旱灾影响,汉江上游一度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后经政府的奖励耕垦、劝课农桑政策鼓励,汉中农业才得以逐渐恢复。尤其明中叶以来荆襄流民的进入,于嘉靖时期达到明代汉中的人口高峰期,并带来了南方关于水稻种植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垦殖的发展。到明末时汉中耕地可达三万顷左右。但因汉中山地多深山,加之山地农业生产技术普遍落后,农耕区扩展并不完全。到清朝时外来流民大量涌进秦巴山区,土地垦殖幅度开始剧增,水利兴修规模空前,农经作物结构更新加快,汉中地区的农业进入了高度发展期。^[32]入清前,汉中沿河谷地才多是稻田。入清以后,略阳和留坝等多山的县陆续开辟水田,“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18]位于汉江谷地的南郑县南部地势高,一直以旱作农业为主,清朝时,“依势节次筑堰”,可灌溉农田,后“凡山麓高下平地无不遍成稻田”。^[33]另稻麦两熟制宋代即已成熟,但因地理环境以及农业技术限制,仅部分地区有所实行。康熙以前,汉江谷地农业耕作模式单一,“是以原则麦,以田则稻,是以岁止一秋”。^[18]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汉中知府经实地考察后指出汉南地区气候温和,冬季也完全具备灌溉条件,因此,“无不可灌者,若之何其不麦”,是以提倡一年两秋。至嘉道时期,汉江谷地已完全实行两熟制,有效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农作物的引进也是农耕区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马铃薯的引进,马铃薯多种于高山地区,乾隆时种植很少,嘉庆时增多,道光以后平地也有栽种,提高了山地的土地垦殖率。(图1)

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长,汉中地区垦荒力度持续加大,经过乾嘉时期的不断开垦,曾经荒芜的汉中山地逐步变成陕西重要的农耕区之一。据《秦疆治略》记载,各县荒山几乎被“开垦无遗”。汉中南郑“因川民

移居日众，昔之深山大林概成熟地”。^[33]嘉庆年间整屋至洋县之间的南山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9]这一时期，汉中地区的土地开发进程显著加快。从乾隆到道光的一百多年间，来自四川、湖北的移民不断推进垦殖范围：他们最初在商丹盆地及周边低山丘陵地带开垦，随后逐步向海拔800至1400米的秦岭中部山区扩展，进入镇安、山阳等县；最终更推进至海拔1400至3000米的高海拔区域，包括宁陕、佛坪、留坝等秦岭腹地。^[34]

移民流入后汉中地区进入农业深度开发阶段，明清时期汉中府县级的政区也随之一再增加。但道光之后，光绪年间人口增长减缓，工商业等发展有所回落，加之之前土地过量垦殖导致植被覆盖减少，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青黄不接时，民间十室九空”，^[35]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使得汉中各县土地抛荒严重，且抛荒率高者甚至可达57.9%，略阳县原有民地14287亩，后实熟地仅有6012亩。其他各县也均有抛荒这种情况，农业生产有所衰落。

四、农耕技术对汉中府政区调整的影响作用

行政区划作为朝廷实施行政管理的具体化，其设置不仅需要综合考量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农业生产水平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等现实条件，还需兼顾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价值。明清两朝前后六百多年，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人们不得不寻求适宜的生活环境来生存。汉中地区由于相对封闭但良好的地理环境而吸引了外地大量的移民进入，广大移民开始在汉中山

地活动，利用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农业开发达到一定程度，过度的土地垦殖便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频发，进而反向制约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农业发展进程，人口又开始不断流失。为了适应或缓解这种消极的影响，政府施行各项政策或调整政区来有效减轻区域压力。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互动中，农耕技术不断得到推广与改进，农业生产获得深度开发，汉中的政区调整也趋于完善。

1. 农耕技术进步促进了汉中府政区变动

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农耕技术受人口规模影响较大，不同的人口空间分布对应不同的农业技术类型，河谷平原地带人口密度高，农业生产技术精细复杂，周边山地人口分布零散，密度较低，农业生产相对简单。明代，西乡县、洋县、城固县、南郑县人口分布较多，农田水利设施也居府中前列，境内多平原，种植结构多样，商品化程度较高，然生产技术暂未得以普遍推广，四县政区建制相对稳定。其他县城农耕技术相对薄弱，人口密度较低，政府为方便统治管理，会适当的进行政区调整。随着人口增长和农耕技术的革新推广，各县农业深度开发，人口规模、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影响了地区的政区调整。比如嘉靖至雍正年间，农田水利技术的应用，使得水利建设更加兴盛，各县渠堰都有增加，尤以西乡、褒城、汉阴、洵阳增长率最高，农业开发程度深（见表2）。其间，政府从西乡县部分地区设置了定远厅，还将汉阴、洵阳等县划分出汉中府，新成立兴安府。可见，农耕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地区农业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发展，加速政区调整。

自明朝建立伊始，政府对汉中府的行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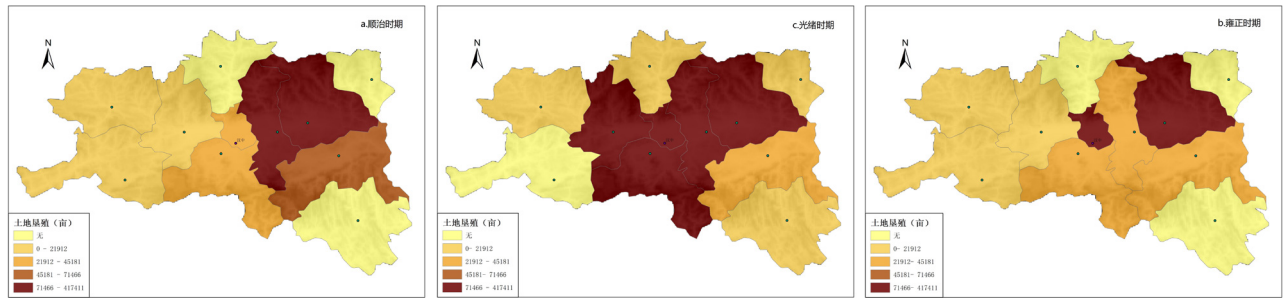


图1 明至清初、雍正、光绪时期汉中各县土地垦殖情况

划一直不断变动。明初至明末除了洋县、南郑县、城固县、褒城县、西乡县外,汉中地区增设了紫阳和白河两个县级政区(见表1),两县设置时间分别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和正德七年(1512年),其对应的是荆襄流民的兴起之际。明中叶以来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量荆襄流民涌入汉中。明成化间,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受朝廷指派处理此事,经安抚和遣还,“已遣散九十三万八千人,出山复业。”^[36]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流民问题。不久后流民再次返回汉中,聚集于此。“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37]对此,朝廷听取了白圭等人的意见,在移民流入多的地方新增府县,将其编入户籍,解决人口忧患。明初“汉阴县二里”,^[25]至成化年间却因此新增八里,移民流入远超本地人口,遂于此时新设白河、紫阳二县。商洛山地人口大量增加后,新增了白河县和山阳县,白河县隶于汉中府。为抚流民,正德五年设立紫阳堡,后又正德七年,分金州西南、汉阴东南地区于紫阳,升为县,隶属于金州(后称兴安州)。

汉中周边地区多山地,人口零星散布,随着人口逐渐增多和农业技术发展,土地开垦范围扩大,为方便管理和控制地区,重要地方的县丞和巡检等升级为与县平级的州或者厅。除此之外,出于边防和军事的考量,在边界紧要地方直接设厅。嘉庆时期从西乡县分出部分设立定远厅,嘉庆五年设置宁陕厅。乾嘉时期是汉中地区人口增长的第二次高峰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外来移民的大量流入,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也进一步深化,乾隆四十年、道光四年分别增设留坝厅和佛坪厅。明清时期汉中地区政区设置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随着人口向山区的不断渗透和山区的不断开发而进行的地域管理和人口组织过程,([24], p.29)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变化,汉中地区的行政区划相应的进行调整,以强化地区的管理。

2. 汉中府政区调整的基本形式

从汉中府州县的政区调整来看,州县等政区的增撤原因各不相同,与人口规模、农耕技术发展、农业开发进程等关系密切。在人口、

技术和政区的互动中,我们能够明确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汉中地区的政区变化主要发生在明朝前期县级政区的多次合并,明末清初的拆分出兴安府,以及清代三次的增设厅制。而这个进程与汉中地区的人口移动及农业技术发展进程一致。一方面,明前期汉中地区的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到明后期达到一个高峰,后因战乱等原因明末清初人口开始回落,直到乾嘉时期人口才再次开始迅速增长,至道光时期达到高峰,之后到清末慢慢才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农耕技术的载体是人口,人口的迁入和迁出直接影响农业的开发进程。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土地垦殖经过了一个先减少再增多再缓缓回落的过程,与汉中的人口规模变化基本一致,且农耕区分布情况也相对应。究其原因,明末清初战乱多发,人口减少,农耕技术推广有限,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汉中地区各县土地垦殖全部减少,尤以城固县、洋县、西乡县、沔县变化最大。乾嘉之后,随着汉中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深度开发,人口再次迅速增加,土地垦殖达到高峰期,除了以城固、洋县、西乡、南郑、沔县为中心的河谷、平川地区外,留坝厅、佛坪厅、定远厅的农耕区也有所扩大。

在人口规模和农耕技术的变化中,汉中府的政区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变动形式:其一,州降县,政区等级降级,如凤州降为凤县;其二,增设厅县,如佛坪厅的增设;第三,增设州,如从汉中府中划分出兴安府。

(1) 州县降等

明初,朝代更替,百废待兴。洪武七年,凤州、沔州直接降为凤县和沔县,金州虽未如此,但从明初开始,其下便相继增加平利县、石泉县、洵阳县、汉阴县、白河县、紫阳县共六个县。据析,宋元之时,金军几次进军陕南,攻占凤州、沔州等地,数经战火破坏,伤亡惨重,农业也由于战争侵扰,日趋凋零,“三关之外,生聚一空”。^[38]为躲避战乱,沔州等地流民众多,“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战乱不休,加之灾害不断,至元末明初,汉中人口大减。洪武

初年,汉中一带“皆灌莽弥望,虎豹所伏,暮夜辄出伤人”,^[39]人口稀少。

元末明初之前,整个陕西的人口变化经历了一个人口锐减的阶段。崇年元年(1102年),凤州有61145口人,然经多次战乱,“汉中被兵,民多惊扰,而堰事荒矣”,^[18]没有渠堰,全靠引河、泉灌溉,农田水利建设严重不足,农业生产落后。洪武四年(1371年),陕西大旱引发饥荒,汉中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乡民因生计无着而纷纷落草为寇,官府都难以遏制。除了人口锐减外,大量农田荒废,许多百姓逃入深山躲避赋役。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官员巡察汉中府时发现,当地居民多栖身于深山之中,平原地区人烟稀少。肥沃的水田除部分由驻军及南郑等县百姓耕种外,其余皆荒草丛生,甚至成为虎豹出没之地。尽管官府多次招抚山民回乡垦荒,但响应者寥寥,导致赋税征收大幅减少。为恢复民生,朝廷“减其租赋,宽其徭役,使居于平野,以渐开垦”。([39], p.22)正是这一年,凤州因人口骤减而被降格为凤县。

(2) 增设县厅

明代汉中府即开始增设厅县,如白河县与紫阳县。清朝基本延续明末建制,增设过留坝厅、定远厅、佛坪厅。这即为第二种政区变化方式,增设厅县。道光四年,汉中府正式设置佛坪厅。而此前,汉中府各厅县人口在道光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据道光三年的人口统计,汉中府人口总数可达1119900口(见上表3)。

明代,为恢复农业发展,朝廷奖励耕垦、劝课农桑,加上戍军屯垦,汉中农业生产力开始逐渐恢复并获得发展。清朝时,汉中府得到大规模垦殖。据史料记载,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对包括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和兴安在内的五府州实施赋税减免政策,共免除“无着荒地一十二万六千三百九十八顷六十四亩零”;([40], p.1)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又针对汉中与兴安两地特别颁布诏令,减免“荒地八千三百八十三顷一十七亩零”。([40], p.2)另朝廷对陕西移民流入持宽容态度,地租低廉,鼓励百姓开垦耕种,“客民给地主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41]这一政策也吸引了

来自江浙、两广、贵州、四川等地的无业贫民大量涌入,“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安身”。^[41]乾隆年间,汉中、兴安、商州等府州所属的秦岭南麓地区,因土地肥沃,大量湖北、四川、甘肃、河南等地的贫民“扶老携幼前来开垦”。^[42]这种大规模移民潮导致秦巴山区原始森林的消失速度达到了历史高峰。乾嘉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土地开发进程的加速,朝廷在汉中府增设了留坝厅和定远厅,道光时又增设了佛坪厅。

以佛坪厅为例,经过明清的恢复发展,佛坪厅的人口规模、农业技术水平均已达到一定程度。曾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山地也有人口活动。如洋县至周至之间的古骆谷一带,“山程七百余里,中间并无州县”,^[9]随着社会安定,各地流民纷纷涌入,搭建棚屋、开垦荒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移民聚集点。然而,由于地处偏远,朝廷管理极为不便。为此,清廷于道光初年在汉中府设立周洋县丞,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管控。

然而,袁家庄位于周至县东南,且被秦岭主脉阻隔,县丞权力有限,难以有效管理周至县境内的深山老林,更难以调集资源镇压匪患。道光四年,陕西巡抚卢坤上奏朝廷,指出周至县东、西、南三面群山环绕,绵延千里,道路险峻,人烟渐增,但因距离县城过远,加之毗邻洋县、眉县、凤县、宝鸡、宁陕、西乡、石泉等地,成为五方杂居、治安混乱之地。地方官远在数百里外,难以有效治理,导致盗匪隐匿,案件频发。百姓诉讼、运输粮食也因山路崎岖而极为不便。为此,卢坤建议在佛坪设厅,因其地处周至、洋县之间,距离适中,且靠近厚畛子、都督河、大小牛尾河等关键区域,便于管理。经陕安道严如煜实地勘察后,朝廷最终采纳建议,于道光五年(1825年)设立佛坪厅,划周至县老君岭以南、洋县华阳以北及袁家庄一带归其管辖,并设置抚民同知和巡检司,以强化治理,维护地方稳定。这一举措不仅优化了行政效率,也有效加强了秦岭山区的管控。

(3) 兴安府的建立

明代沿袭元制,仍设金州(后改为兴安州)。

经过洪武、成化、正德年间的多次县域调整,以及嘉靖时期的政区变革,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金州正式更名为兴安州,并重新管辖石泉、汉阴二县。此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兴安州脱离汉中府管辖,升格为陕西布政司直隶州,统辖汉阴、平利、洵阳、紫阳、白河、石泉等县。而这一政区调整正是基于日益增加的人口以及地区农业的深度开发。

据嘉靖二十年人口统计,金州军民共24322口,当时就仅次于洋县而已。随着移民的不断流入,以及新增县城,州内所辖总人数急剧增加。嘉靖二十年(1541年),兴安府仅洵阳一县就有13952口,万历九年(1581年),洵阳县更增至26150口,比嘉靖二十年增长50.9%。且据薛平栓估计,从嘉靖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八年,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左右。^[28]足见,兴安府万历年间人口增长快。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当地的土地垦殖,农耕区范围不断扩大。明代政府还在汉中地区设置了汉中、宁羌二卫,金州、勉县二千户所。金州在嘉靖年间总田额为404顷39亩,到明末已增加到1463顷84亩。金州的桑蚕、棉花、茶等农作物产量也很可观。据记载,金州桑田可达31顷9亩,远超其他州县。嘉靖年间,金州茶课4444斤,仅次于西乡和紫阳两县。兴安州(原金州)棉花产量也比较大,在穆宗隆庆年间有棉地12顷94亩。除此之外,金州、汉阴、洵阳等县经历了清初的休养生息,开始兴修渠堰,

开发各种水源(山沟水、泉水、溪水),至清代雍正时,农田水利渠堰数由明末的两三座增加至三十多座,水利设施发达。因此,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农业生产规模,都超过普通县城的规模。加之从兴安州到汉中府路途遥远,山高路险,州县和府城往来不便。为了方便地区管理,政府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提升兴安州为直隶州,并下辖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图2)

结 语

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对农业技术发展和政区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时期是汉中府历史上人口迁移相当频繁的时期,来自湖广等地的流民在这一时期大量迁入,人口增多,土地开垦加剧,与此同时,外来移民还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得益于此,促进了地区农业进一步开发,使得汉中地区的农业从汉江河谷逐渐发展到周边山地。正是在这种人与土地的互动过程中,基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汉中地区做出了相应的政区调整:州降县、增设厅县、拆分出府。因此,汉中地区的人口变化与农业发展状况,与政区变动之间具有一个互相契合的律动过程:

首先,汉中地区的人口规模经历了明朝时期的增长,明末清初的回落,乾嘉时期的回升,道光之后的逐步回落。其次,农耕技术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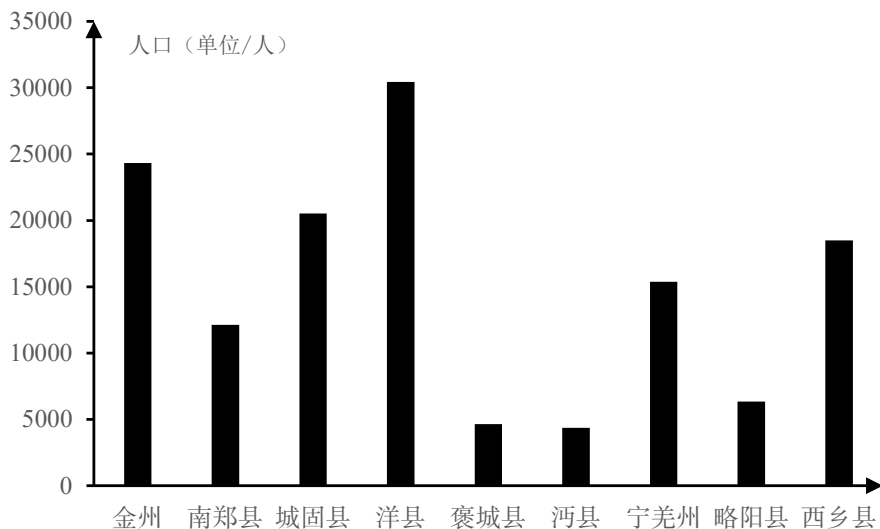


图2 嘉靖二十年汉中府各州县人口统计

是人,人口规模影响农耕技术的发展,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农耕技术相对复杂,农业生产发达,反之农耕技术推广滞后,农业发展较慢。伴随着人口的变化,汉中地区的农耕区也经历了从平原到山地的拓展过程,并在乾道年间达到巅峰,只是在清初出现过短暂的田地荒芜的回潮。最后,与之相应的,明代开始汉中开始出现府县析分与增置,经过反复调整适应,至乾道年间才逐渐趋于稳定。第三,从空间上看,明清时期汉中最先增设的府县基本位于农耕技术发达的汉江谷地和平原地区(汉水流域增设数县并最终成立兴安府),其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山地农业的深度开发,才在周边山地依次增设留坝厅、定远厅和佛坪厅。至此,汉中地区在人口规模和农耕技术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由汉中盆地为中心向外扩散,沿江河沿线逐步延伸的政区建制。

【参考文献】

- [1] 萧正洪. 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 (1): 33-43.
- [2] 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 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 (4): 115-126; 161.
- [3] 耿占军. 清代陕西农业历史地理研究[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 [4] 颜玉怀、樊志民.《秦疆治略》中所见清末陕西农业[J]. 中国农史, 1995, (4): 69-75.
- [5] 吴宾. 秦汉魏晋时期陕南地区农业开发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43-47.
- [6]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7] 李大海. 政区变动与区域社会: 以明清陕西地区为中心[M]. 上海: 中西书局, 2024.
- [8] 胡英泽. 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6, 7: 199-219.
- [9]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M]. 清道光来鹿堂刻本.
- [10] 高岱撰. 鸿猷录(卷十一)[M]. 明万历阳羨陈于廷刻纪录汇编本.
- [11] 赵廷瑞. 陕西通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 [12] 陕西省图书馆. 佛坪厅乡土志[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2.
- [13] 严一青. 白河县志(卷十四)[M]. 清嘉庆刻本.
- [14] 萧正洪. 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J]. 中国农史, 1988, (4): 69-84.
- [15] 陈显远. 唐公车湃水利碑[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6, 257.
- [16] 光朝魁. 褒城县志(卷六)[M]. 清道光钞本.
- [17] 葛剑雄.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蜀道驿程记[M]. 上海: 上海交大出版社, 2017, 374.
- [18] 严如煜. 汉南续修郡志[M]. 民国十三年刻本.
- [19] 卢坤. 秦疆治略[M]. 道光年间刊本.
- [20] 余修凤. 定远厅志[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97.
- [21] 陈宏谋. 广行山蚕橄[A], 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2.
- [22] 林一铭. 宁陕厅志[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178.
- [23]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67.
- [24] 陶卫宁. 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 [25] 李贤、彭时. 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四)[M]. 天顺五年御製序刊本, 51-53.
- [26] 孟乔芳. 孟忠毅公奏议卷下[M]. 北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刻本.
- [27] 沈青崖. 陕西通志(卷二十四)[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8] 薛平拴. 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9] 佐尧. 西乡县乡土志[M]. 民国抄本.
- [30] 孙铭钟. 沔县志(卷四)[M]. 清光绪刻本.
- [31] 萧正洪. 清代西部地区的人口与农业技术选择[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1): 96-105; 176.
- [32] 马强. 论宋元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发展[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7, (3): 103-108.
- [33] 蓝培原. 续修南郑县志(卷二)[M]. 民国十年刊本.
- [34] 张萍. 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4, 26.
- [35] 严一青. 白河县志(卷十四)[M]. 清嘉庆刻本.
- [36]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M]. 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 [37] 张廷玉.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M]. 清乾隆武英殿校刻本.
- [38] 魏了翁. 鹤山全集(卷八十二)[M]. 四部丛刊景宋本.
- [39]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M].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
- [40] 钱鹤年. 汉阴厅志(卷四)[M]. 清嘉庆刻本.
- [41] 王先谦. 东华续录(卷二)[M]. 清光绪刻本.
- [42] 贺长龄. 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M]. 清光绪思补楼重校本.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